

# 第一篇 地狱图





## 一、被强掳到日本集体管制

1944年8月8日，从早晨起天气就那么闷热，第1批295名中国人被带到花冈矿山。大馆车站前，中午时候开始，一批警察就聚集在那里，腰里都挎着手枪和日本刀，手里提着木剑，神情十分紧张。

不久，一列货车在大馆车站停下，立刻从车上跳下来十几名枪上了刺刀的日本兵。警察们团团地围住铁闷子车，打开了铁门的锁，一群中国人就象往出卸货似地给推下站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很好地站起来走动了。这批人当中的一位名叫李振平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坐上火车第四天的中午才到了花冈。车门打开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着走下车，都是连滚带爬从车上掉下来的。我从车上掉下来时摔伤了腰，简直象断了气似的，怎么也站不起来，日本宪兵在身后用木剑狠命捅我，好容易站了起来，可是摇摇晃晃就是走不动了。

关于李振平的情况，后面还要详细介绍。他是被日本军捉获送来日本的，是花冈事件策谋者之一。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作为审判的证人留在日本，长期居留下来，现住在北海道的札幌市。由于是初到秋田县这块土地，所以错把大馆车站认作是花冈站了。

实际上，就连我也把情况弄错了，我也认为乘货轮到山口县下关市的中国人是从下关坐了4天火车直接到花冈的。原来国营铁路直接连接到花冈线是1951年11月才开始的，1944年还必须在大馆车站换车才能到花冈去。关于这一点，一位日本人提出这样的证词：

当时在大馆机务段工作，现任大馆市议员的工藤良一介

绍说：“那大概是 1944 年 8 月左右的事情吧。不是货车，是破旧的客车，都是衣衫破烂不堪，有宪兵看着，不让人靠近。因为觉得新奇，机务段的人们都躲在车库里偷着看。有的用又黑又脏的毯子裹着抬着走，大概是尸体。一群拿着棍棒武器的人在后面押送，拖拖拉拉沿着车站西边的铁路走去，真有点惨不忍睹。我们听说那是俘虏团”。（引自清水弟著《花冈事件笔记》秋田书房版）

同一时期在站前商店工作的 A 子女士（当时 19 岁），也去看过中国人的队列，说：

有人嚷着看热闹去，便跟着去了。因为有好多当兵的，有点害怕便躲在远处看望。都是东倒西歪地向前挪动着，没有一个挺直身子走的。我们那时穿的衣服就够差劲了，这些人穿的就更破烂不堪，简直象是披着一些烂布片，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过后才听说是中国人俘虏，我也看到过美国人和朝鲜的俘虏，可都不象这么惨！

正如以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谈到的，乘火车来到大馆的一行由于过度疲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上被日本军抓住便被送到俘虏收容所，进一步坐着货轮到日本，中国人一直受到残酷的待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后还要详细地加以描述。这第一批出发时实际上是 300 人，从青岛收容所往轮船去的途中有一人因逃跑被枪杀，有一个人上船后跳进了海中，在船上又死了一个人。从中国大陆到日本的旅途中，一直是与死为邻，从下关到大馆的旅途也是同样的。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李振平的叙述吧，他说：

日本是个产鱼的国家，我想一到日本一定要好好地吃上一顿鱼，可是连水都不给喝。第二天给了两个饭团子，因为几天没吃东西了，大家都把它狼吞虎咽了。从下关到花冈坐了 4 天火车，这中间只给了一个饭盒，甚至想连那个木片做

的饭盒都吃下去才称心似的。我们那 297 个人当中，50 岁以上的约有 20 人左右，不满 16 岁的少年有 6 人。剩下的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正是能吃的年龄，可是 4 天只给了一个饭盒，连水也不给一口，一个个饿的双眼发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引自野添宪治著《花冈事件中的人们——强掳中国人的记录》评论社出版）

据大馆机务段的人们的证词说，从下关到大馆坐的是“破旧客车”可是我遇到的 3 位中国人都说是铁闷子车。铁闷子车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车一摇动就向一边倒去。因为身体太弱站不住就坐在铁板上，便形成了人压人的状态。

同时，说是“坐上了”铁闷子车，实际上是象装罐头似地硬塞进去的，然后在外边上个大铁锁，车里连空气都进不来。火车开动时从缝隙处可以流进一些空气，大家换着个儿爬到缝隙处呼吸点新鲜空气，车一停下便闷得出不来气，真和地狱没两样。

4 天当中只给了一个饭盒子，滴水未进，人们的嗓子都干得要冒火，简直都要发疯了。有的人实在忍不住渴，最终只好喝自己的尿。可是喝的尿又那么苦，干渴的嗓子上又添了一些盐分，疼痛难忍，甚至高声呼喊着想拿头向车厢上碰撞，嚎啕不已。

所以，从下关上车时是 297 人，到大馆时又有两个人死亡了。因为正是酷暑季节，死尸很快腐烂，车厢里充满的死人臭气在折磨着这些中国人，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死亡的旅程。

好不容易熬到大馆车站，换上去大馆支线客车的中国人，在众多警察监押下奔向花冈矿山。

经过 4 天，总算坐上了能呼吸空气的火车。

到达终点站花冈车站时，被带到一个名叫共乐馆的剧院广场上去。由于在大馆和花冈都是既未给午饭吃也未给水喝，因营养失调脸色变得黑青，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肚子瘪的成了两张皮，只有两个大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

在炎热的太阳照射下 在广场上排成队 又等了好长时间。有的身体虚弱得站不住，便扒扶在旁边人的肩膀上。

在共乐馆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要看看中国人，形成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有位中年的家庭主妇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中国人，不由地顺口说道：

“怪可怜的啊，在这么大热天的时候，还赤足光脚地在走路……”

她的话被一个警察听到了，跑了过去用拳头照着主妇的脸狠狠地打了一拳，骂道：

“你这个不爱国的混帐东西！”

主妇嚎叫了一声倒在地上 从鼻子里咕嘟咕嘟直往外淌血 可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过去扶一把。看热闹的人都被这杀气腾腾的局面镇住，一个个悄悄地离开了广场，很多人只是从窗户的缝隙或躲在阴暗的角落偷着看。

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所长，也就是中国人要住进去的中山寮寮长河野正敏，站在木箱子上开始训话，由华北劳工协会派来的翻译于杰臣译给大家听。训话很长，大致的意思说：

“为了大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 日本在进行着一场圣战——大东亚战争。日本是神道的国家 有不败的皇军和伟大的大和魂 所以必胜。因此 你们来到了日本一定要很好的劳动。如果怠工 要严加惩罚。”

不一会儿，中国人一行在警察和鹿岛组花冈事务所的辅导员（工地监工）们的包围下开始行动。从矿山街经过花冈车站前 在穿过花冈矿业所墙外，是一条碎石块的陡坡路。4天当中只吃了一饭盒饭的中国人行走非常迟缓，有的人踉踉跄跄一步步地向前挪动。这时警察就一个劲地用木剑或竹棍殴打、乱捅，有人呻吟却无人叫喊。

当炎热的骄阳要落山的时候，全体人员来到了中山寮。粗糙

不堪的中山寮建在太阳不大照得到的阴湿地方。那附近，一户民房都没有，从矿山街根本看不到中山寮。

中山寮有 3 栋长方形的房子，对面另外一栋是辅导员的事务所、值班室、伙房和仓库等。这就是中国人的宿舍，一长溜，象火车的车厢似的，中间是走道，两边用木板搭成铺，分上下两层。非常低矮，身量高的人不低头就要挨撞。

离这 4 栋房不远的地方有一栋看护室，其中除了收容病号的房间之外，有骨灰安放室和看护人员的住室。从这个看护室往山上去有火葬场，旁边有条小河流过。这就是中山寮的全景。

中国人在寮的前面排队点名后，监押的警察将这些人移交给鹿岛组后各自回去了。以后虽然宪兵和警察几乎每天都要来巡视一番，可是对中国人的管理，就全部由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承担了。

从中国大陆出发时就指定耿谆任这 295 人的大队长。耿谆是原国民党的军官，是个威信很高的人。再由他来指定队里的干部，到了花冈山后便分派到各个人的头上。

大队长下设副大队长、书记、军需长、看护长各一人，全大队分为三个中队 中队下设小队 分别安排了中队长及小队长。看护长下面有三名看护。中队长以上的人们干活比在现场劳动的人们要轻松一些。

中国人经过编队后都进入自己今后生活起居的房屋。林树森谈了当天晚间的情况。关于林树森的情况，以后还要详细加以介绍，他也和李振平同样留下作为审判的证人，一直在日本定居了。他说：

到了花冈矿山的那天晚上说是要会餐，家都在高兴地盼望着能够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直等到半夜才开饭，端上来的却是一条小沙丁鱼和每个人一个包子。因为寮里根本没为我们准备下炊事人员 是现从我们当中挑选炊事员做的 所以晚了。说是“包子”，其实只有很少一点面粉，剩下的都是

些苹果渣子和橡子面之类的，包子馅是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似的东西。硬梆梆的，根本没有包子的味道。因为大家都饿的了不得，沙丁鱼和包子都很快吃光了。沙丁鱼连头带刺都嚼了，大的鱼骨头也没剩下。

正如林树森所说的那样，从那天晚上起等待着他们的一直是地狱般的饮食生活。可是，饿了好久的人们，一条沙丁鱼和一个包子确实够美的了。老林还谈到那天晚上的情况，他说：

一条沙丁鱼一个包子谁也没吃饱。然后就让洗脸，从寮旁边的小河打来水，大家就喝。可是，喝那水如果被辅导员们发现了要挨揍，只好先洗了脸假装是泼掉而偷偷地喝了。就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小河里有的是水，喝多少对谁也没坏处，为什么就是不许喝呢？大家喝水是为了撑鼓肚子，如果发现谁喝水就要挨棍子，真怪啦！

吃了一条沙丁鱼一个包子，洗完脸喝了洗脸水，不久睡觉的喇叭吹响了，寮的通道上吊着的唯一一盏煤油灯也熄灭了。

中国人都穿着衣服躺在木板上，躬着腰抱着自己的膝盖睡了。木板床上既没铺上凉席，也没有盖的东西。有的人从大陆来时发给的衬衫也都穿破了。

花冈矿山白天虽然那么热，到夜里这个叫姥泽的地方就凉了起来。冷飕飕的夜风不断地从木板房的缝隙往里吹，弄得人直发抖。

鹿岛组从何时起在花冈矿山设立了事务所，承包下藤田组的工程，现在已经弄不清了。据同和矿业公司的《70年回忆录》中记载着：“选矿场工程由清水组承包，水坝及河道工程由鹿岛组承包，这些承包项目动员了秋田县的土木建筑行业”。看来，大型土木建筑公司在很早以前就进入花冈矿山了。

被强掳来的第一批 295 名中国人，来到花冈后，当时在花冈矿山与中山寮中工作的日本人员有下述几人（年龄是 1944 年当时

的岁数 )

河野正敏 (40岁)是花冈事务所所长兼中山寮寮长。但是，寮长的工作都交给了代理寮长伊势，他自己大都蹲在离中山寮 1 公里左右的花冈事务所里。河野的下面是劳务科科长柴田三郎 (45岁) 劳务股的高久兼松和佐藤勇藏 供应股的塚田龟夫等 加上女事务员约有 20 人左右。

河野在大馆市大町租有房子住在那里，从那里往事务所上下班。据说，还动员了中国人在院子里修了一个高级的防空壕。

中山寮的代理寮长伊势知得 (40岁)本来是法院的文书 他一方面听从河野的指挥又承担起全部工作。伊势的手下有个庶务 (粮食股) 小畑惣之助 (32岁)，是个从中国战场归国的伤兵。此外，有个叫有明千代吉 (45) 的退伍军人，他是在中国人发起暴动的两天前才雇用来的。还有一个庶务 (事务股) 叫越后谷义勇 (19岁)，未当过兵。因为过分偏向中国人，在同事中不大吃香。

实际从事监工的辅导员有福田金五郎 (35岁) 长崎辰藏 (30岁)、猪股清 (30岁)、桧森昌治 (35岁) 和吉谷四郎 (25岁) 等五人，他们和小畑同样都是从中国战场归国的伤兵。清水正夫 (25岁) 是个日中混血儿，中国话说得特别好。石川忠助 (40岁)，也和越后谷同样对中国人有好感受到大家的信赖。

担任医务工作的高桥丰吉 (45岁) 本来是个卫生兵 当然没有医师的资格。高桥每天到中山寮来转上一圈，从不给人治病。矿山医院有个大内正医生，只管给开死亡证明，并不给病人治病。

此外，大馆警察署的巡查部长后藤健三，本来是个便衣警察，自从中国人来到中山寮后便负责巡哨工作，每天都要到中山寮或工作现场来。同时，由华北劳工协会派来的翻译于杰臣也来往于中山寮及工地。同样从华北劳工协会来的木村初一，只是坐在鹿岛组花冈事务所，不大和中国人接触。

就是这些人在和被掳到花冈矿山来的中国人打交道。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辅导员中有 5 个人、庶务 1 个人是从中国战场归来的伤兵，还有 1 个是日中混血儿。他们都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经验，也许录用的条件是会一句半句中国话。结果，这些人把在中国大陆上干过的那套做法，又原封地搬到花冈来了。

那么，被强掳来的中国人们，对包括那些辅导员在内的有关人员是怎样的看法呢？花冈事件的活证人，现住在北海道札幌市的刘智渠有这样一段回忆。这是初到花冈矿山那天早晨，伊势代理寮长训话时的回忆，中国人是第一次看到在中山寮管理自己的日本人。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他说：

站在伊势左边的辅导员，是个身量不太高，头和眼睛都很大的家伙，带着副大眼镜，面孔绷得紧紧的，给人一种极其骄傲自大的感觉。胸前的白布条上写着“福田”的字样。他左边站着的是叫“清水”是个小胖墩，身量比福田更矮，很脏，不太漂亮的家伙。再往左边的叫“石川”是个中年汉子，留着八字胡，长像凶恶满脸煞气。最左边的是“越山”瘦高个儿，穿的衣服上有好多补丁。伊势的右边是“小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瘪脑袋壳大嘴唇，大眼睛，看去象个活阎王似的。挨着小畑右边的是“猪股”和伊势一样丝毫笑容都没有，真是象猪似的家伙。最右边的叫“长崎”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细看来，原来只有一只眼，另外一只眼瞎了。虽然是个独眼龙，可是单眼看人比普通人的两只眼看人好象有股射人的光似的，比普通人的两只眼更可怕。日本真是“神国”，伊势手下的七员勇猛的“虎将”，没有一个不象凶煞神的。可惜的是缺少一个瘸子“李铁拐”后来添上了一个成了“八仙”（刘智渠口述 刘永露、陈萼芳记录。摘自中国俘虏牺牲者善后委员会发行的《花冈事件——成了日本俘虏的一名中国人的手记》）

这里的人名也许有不正确或错记的 那个描述也有些单调。可

是，那种充满憎恨的叙述，正实地反映出那些中国人，曾在这些人的手下受到多少折磨；这些情况，在我们以后说明事件发展过程中，会更加明晰的。

关于那些辅导员，另外两位中国人也有过如下的证词：

我们这些人都不懂日本话，可是一听到辅导员们“喂——”地喊叫一声，那不是要挨揍就是要挨踢。只要一听他们的喊叫声，就全身都僵硬了。即使是到现在，耳边好象还响着他们的叫喊声似的！（林树森述）

辅导员们大多懂得中国话，几乎都听得懂我们的话。所以，我们都不敢随便发牢骚或说点什么不满意的话。只要让他们听到点什么，立刻大棍子就会飞过来的。（李振平述）

这三位中国人在花冈矿山过的都是奴隶般的生活，对曾经向他们下过毒手的辅导员们的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把这伙人召集来当辅导员，才有着使花冈事件发展扩大的根源吧。同时，又加上“战时”这个特殊条件，……。

## 二、中山寮的生活

中国人在花冈矿山的劳动，是从每天早晨 5 点吹响起床号开始的。一听到军号声便慌忙爬起来坐在铺板上。因为都是穿着衣服睡觉，既不需要更换衣服也不需叠什么被子，也没有什么洗脸刷牙的用具和场所。坐在铺上打两个呵欠，揉一揉腰，用手心抚摸几下脸，早晨的准备工作就算结束了。

到开早饭的时候，东方的天空才开始显出鱼白色来。早饭是每个人一个小馒头和一块萝卜干，还没觉得吃就完了。

到微弱的阳光开始照到大地上的时候，全体中国人被叫到外面，在中山寮前排队立正站好。不一会伊势寮长和辅导员们也都

来到，大家一起向南方举行“皇宫遥拜”。这一套做完了以后，伊势寮长开始训话，于翻译把它翻成中国话给大家听，他说：

“因为你们是初到花冈，作为特别照顾，最初一个星期放假，以后就要投入正规的劳动啦。可是，这一周的时间如果只是游手好闲，也未免太可惜，所以要开山造田。这项工作也算大家为大东亚建设尽点义务，一定要使劲干，不准偷懒！”

训话完了后，分班（10个人1班）开始干活。大队长、中、小队长等干部去花冈川改道的工程现场去看活儿，看护班的人们修厕所和在寮前挖口井及打扫环境卫生。其他人都去参加开荒造田的劳动。中山寮的设备丝毫也未加改善。前述的3个人；就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的陈述：

中山寮里什么设备都没有。我们是8月中旬到的花冈矿山，白天很热夜间就很凉了。因为我们还不习惯日本的气候，尤其感到冷。睡觉的地方是上下两层铺，一条被褥都没有。也没有替换的衣服。只有穿着的一套衣服和衣而卧，把自己的胳膊当枕头。因为太疲劳了，倒是都睡得着，夜里却不知道被寒气冻醒几次，所以都解除不了疲劳，身体越来越弱。（李振平述）

最低限度能铺上块草蓆也好，可连那个也没有。中山寮位于山的中腰，夜里山风吹下来，更是冷得很。寒风从木板房的缝隙吹进来，浑身冻得乱颤，只好弓着身子拖着腿睡，简直是要冻死人。（林树森述）

中山寮里没有澡堂子，满身都是泥垢。也没有一把剃头刀，头发胡子乱蓬蓬的。只有一套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我们那副形象，就和在地狱里受磨难的小鬼一个样！（刘智渠述）

要说1944年的8月，日本也确实够穷的。可是，对于被强掳到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也有点太过份了。而且，这种恶劣的待遇

随着进入秋天在日益升级。

特别照顾的一周很快过去了，终于到了投入正规劳动的日子。鹿岛组从藤田组那里承包下的工程，是将花冈川在信正寺附近改道，通过前田北部的西边横断神山台高地而流入大森川。因为很难雇到日本工人，便根据政府的方针将强掳来的中国人转移到这里来了。

开工那天，在寒风刺骨的早晨，伊势寮长又对寮前整队待发的中国人训话，说：

“特别照顾的一周于昨天结束了，从今天起要进入正规劳动，矿山是建设大东亚的动力之一，在作业中决不许有丝毫的懈怠”。

翻译于杰臣在断断续续地翻译着讲话，可是中国人迫于疲劳和寒风，几乎无一人听那个训话。伊势寮长训话完毕，队伍排成几行向工地出发，辅导员们分别插在队列中，瞪着眼睛监视着。

日本人对中国人从姥泽的中山寮到工地去的途中，做了巧妙的安排，尽量不让人看见。这样绕着道走，到工地的距离就拉远了。同样，被带到花冈矿山的美国人和朝鲜人的俘虏，也都不让当地日本居民看见。

中国人们“随着日出从姥泽出发，经过观音堂的后山道，从那里被驱赶着往花冈川上游的新水道工地去。在这途中的村庄，只是在上游水坝西岸附近有个小部落叫白泽，从那里渡过东岸有一条穿过长屋镇后山的通道。那条路从长屋镇向北可以通到国民小学和乡公所所在的花冈镇。俘虏们横穿过那条路，立刻被赶着奔向东边的后山道。在白泽，有盆地唯一的寺院信正寺和二十来户散居着的耕种山阴田的农户。结果，能看到这些中国人队伍的只有早晨去种田的白泽的老百姓和通过这条路往返于矿山镇的妇女挺身队队员以及到现场去做饭的女炊事员等的极少数人们而已”

（引自松田解子著《地下的人们》民众社出版）。

当时曾经看到过往返于中山寮和工地之间的中国人队伍，家

住在花冈镇名叫 B 子( 当时 26 岁 )的 现住在秋田市。因为是农民家的儿媳妇，有时在庄稼地里看到，有时在道路上遇到过。她说：

每天都是同样的，一清早就排着两列或三列走向工地 队伍拖的很长很长。听人们说中国人很可怕，所以中国人来时总是离得远远的。也不知是饿的，还是累的，走起路来都是摇摇晃晃一溜歪斜，怪可怜的。如果站在那里看，就会遭到辅导员们的白眼，便假装着不去看。虽说不去看，可还是偷着瞧。要是日本人那样子走路，那一定是患了病的人了。现在想起来，那些中国人可能都是病号啦。病号还要让人家劳动，虽说是战时，鹿岛组的人们也确实够狠的了！

中国人们也谈到从姥泽的中山寮往工地去的痛苦劲儿。他们说：

劳动时间是从早晨 6 点钟开始，可是从中山寮到掘河工地，路程好远哪。我在看护班，开始时没有病人也去干土方活儿。当有人死在工地时，便把尸体运回姥泽烧掉。有的被辅导员揍得走不动路。也得运回中山寮去。好家伙，可真够远的啊！（林树森述）

就是远哪！有七、八里路 而且有一半以上是山坡道。早晨去的时候是下坡路还好，晚上收工时可够呛啦。半路上喘不过气来，要休息好几次。如果让辅导员看到你休息时，大棍子就抡了过来 所以有时累得要命也不敢休息一下啊！（李振平述）

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选择那种不让人看见的路途，不仅是不愿让日本人看到外国人俘虏，更主要的是因为不愿让看到，在辅导员的棍下打得半死不活的，让人背着走的中国人的情景。而且，还有时搬运着被辅导员们打死了的中国人的情况。

往返于中山寮和工地之间的路程已经够受的了，但工地的活

儿更艰巨、更苦。挖河的地方，是杂木繁生和石头遍地的平地。手里拿着兰图的日本技师们和扯着卷尺的助手，竖起红白色的标杆在进行测量。旁边放着经纬仪和水平仪。在测量完了的工地上，中国人“用锯呀、铁锹等放倒杂木和铲掉草根等，有的地方挖去了地表土，不久开出了一道 3 米宽河道的雏型；有的工地从上边顺着临时铺设的小铁轨用手推车往洼地运土（引自《地下的人们》），开始了作业。这些人都是初次干这种日本式的土木工程，是太辛苦啦。

工程是从地平面向下深挖，建造一个流水的河道。工作的做法，是由辅导员告诉给大队长，然后再由大队长分段转告给中队长、小队长和班长。收工时间本来规定的是午后 6 点，可是到 6 点钟能回去的却没有几个人。每人每天的工作量是挖河面积 1 平方米。到 6 点钟能完成工作量的人可以回去，完不成的黑了天也不许回去，有的人要干到晚 8 点钟左右哪！（李振平述）

一台土木工程的机械都没有，只有锹、镐和绳子编的网篮，全都是体力活。而且，每个人分配给一天的工作量，要完成它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

我们把第 1 批的 295 人按年龄的差别来看一下时，十几岁的 24 人，20 多岁的 90 人，30 多岁的 49 人，40 多岁的 24 人，50 岁左右的 30 人，剩下的不详。十几岁的孩子和 50 多岁的老年人分给的工作量都同样。那些 20 到 40 岁的血气方刚、年青力壮的人问题不大，对这些年少和老年人的工作量就太大了。午后 6 点以前完不成工作量，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中国人除了劳动条件太苛刻外，辅导员们的暴力又经常伤害着他们的体质。

在工地干活的人，分成几个班。每班 10 个人，要分配给 10 平方米。因为是从平地挖河，石头特别多。挖出的石头必

须运到河的上游，可是没有力气，就够费劲的了。几十公斤重的大石头，三、四个人都抬不上去。好容易搬到中途，因为没了力气又掉到河底下去的事时有发生，要是让辅导员们看到，就要遭到牛筋鞭子和棍棒的无情敲打。倒下来时，使用带有铁钉子的皮靴使劲地踩、踏，还骂不绝口。（林树森述）

曾经看到中国人这种劳动情况的日本人，做了如下的证词：

土木作业员木村喜代美（43岁）看到那些人，都是满身虱子，大清早就排成三、四列向工地走去，队列好长啊！工作也够苦的了。在网篮里装上三、两锹土，就摇摇晃晃很吃力地挑起来，看来都是皮包骨的老年人了。（摘自《花冈笔记》）

当时住在花冈镇的K子（64岁），一边哄着小孙子，讲了下述情况。她现在住在弘前市，可是不愿给在大馆的亲戚添麻烦，几次三番嘱咐不要说出她的名字。她说：

我是从战争发动后，作为妇女挺身队的队员到矿山去参加劳动的。去干活的途中要经过中国人劳动的工地。所以，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啊。当我们走到中国人的工地时，总是要加快脚步走过去。看样子都是饿着肚子似的，干活也是摇摇晃晃的。有时听到日本辅导员在那里大声的叫骂。简直都不象是活人啊！

我看到K子的面孔上至今还带着惶恐的样子，想象着中国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劳动状况。让我们还是继续听一听林树森的证词吧。

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被派到远处山里去抬一根长长的杉木。因为是新伐倒的青木头，可真够重的。还未能抬到挖河的工地，天就黑了。脚底下直打晃。肚子也饿，眼睛冒金花。我那个伙伴倒下了，辅导员跑过来抡起棍子就打。他

含着眼泪站了起来，两个人一摇一摆地往前抬。到晚 8 点钟才到达工地，可是两个人都再也走不动了。辅导员清水挥舞起棍子，催我们赶快回寮去。这时候真觉得不如死了好哪。那个伙伴让清水把胳膊打断了，终生成为残废。

刘智渠说：

有的人干不完活，直到我们睡觉时才回到中山寮来。一步三晃，甚至在寮里都走不动了，好象用手指一捅就会倒了似的。就是那样的人，第二天早晨还得 6 点钟起床照样出去干活。每个人一天要挖 1 平方米的面积，太苛刻啦。日本人真不讲理啊！

虽然干的是重劳动，可是这些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伙食依然是一根或半根咸萝卜干。劳动是那么重，伙食是质量次又少，更加重了中国人的痛苦。同时，因为工程进度不快，鹿岛组花冈事务所发了火，辅导员们也就更加蛮狠胡来起来。

由于在中国大陆被日本军抓到以后一直是粮食不够吃，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营养失调。因此，造成人们因体弱完不成工作量而遭到辅导员们殴打的恶性循环。关于粮食不足的情况，中国人们有如下的发言：

我们大多数是生长在农村的，从小就干活，干点活并不算什么。很多人还是爱劳动的。可是，在花冈只给那么一点食物，却让干那样重活，身体虚弱，走不动路抬不动石头就要挨打受骂。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就算是多么爱劳动的人，也没有法子干了。（林树森述）

就是在中国，我们的日子也不算太好。加入八路军以后，生活也很艰苦，吃的也不太好。可是，吃的多呀。只要肚子填饱了就有力气，就能干活。一个黑馒头，半块萝卜干，怎么会有力气干活啊！（刘智渠述）

因为饿得太厉害，中午休息时，乘着辅导员不在时，有